

新闻背景

根据教育部近日印发的《高校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实施方案》，2020年从部分部属高校招募120至140名退休教师支援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塔里木大学和滇西应用技术大学。

首批援派教师一般从教育部直属高校的退休人员中遴选，年龄一般在70(含)岁以下(身体状况较好者可适当放宽年龄要求)，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一线教学科研经验丰富。

《方案》为援派教师提供了三种支援方式：长期、短期和远程。其中，长期援派教师，支援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每学年承担不少于64课时的教学工作，参与指导1项课题研究，通过传、帮、带方式指导青年教师，组织开展若干学术讲座、教研等活动；短期和远程支援教师，按照“突出实效、形式多样、时间灵活”的原则，根据受援高校需求，认真做好支教、支研工作。

多年前，当章卫平的身份从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在岗教师，变为该院“退休教师”时，他并不会想到多年后的今天，自己会在另一个从来没有来过的地方，重新走上三尺讲台。

这个地方就是距离北京直线距离超过2600公里的新疆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在这里的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以下简称克拉玛依校区)，一群学生正在等待着他们的章老师为他们讲授大学数学课程。

本应是享受生活的年纪，却远赴数千里之外的新疆腹地。促使章卫平踏上这条支教之路的，是今年3月底由教育部启动实施的“高校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以下简称银龄教师计划)。在它的感召下，一群如章卫平一样的老教师告别了退休生活的闲适，重新回到了学生们渴求知识的眼光中。

高校的呼声

今年2月底，为进一步加强西部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教育部研究制定了《高校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该《方案》的推出，其实源于一次新疆工作座谈会。

这次座谈会上，多所西部高校列席，银龄教师计划中接受支援的克拉玛依校区、塔里木大学和滇西应用技术大学3所高校也位居其中。这些高校将它们现状与困难一一做了陈述。其中，师资的匮乏问题引起了教育部的重视，其相关意见也被教育部采纳，此后才有了《方案》的提出及银龄教师计划的启动。

此批支援计划之所以选中上述三所高校，是因为援建克拉玛依校区的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是我国重要的能源类行业高校、世界能源大学联盟牵头高校，而克拉玛依市本身又是石油城市，其口号是打造“世界石油城”。因此，克拉玛依校区肩负的任务和责任非常重大。而塔里木大学则是一所位于新疆的二本学校，因地域因素，相比内地，该校的信息和交通便捷程度仍比较低，师资力量匮乏，大专家级的讲座也不太多。至于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则是全国首批应用技术大学，新建公办二本，是“因扶贫而生”的大学，建设时间短，专业人才不足。

在《方案》实施过程中，“教育部首先组织部属高校与我们召开了对接会，让我们把教师人才的需求报给部属高校人事部门。”塔里木大学人事处处长熊仁次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谈道。

随着向南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身处腹地的塔里木大学被党中央、教育部、自治区和兵团寄予厚望，希望这里能够培育出更多爱国爱疆、担当奉献、扎根边疆、献身边疆的有用人才。“我们的办学规模在不断扩大，学校师资短缺的问题也日益凸显。”熊仁次在接受采访时坦言。

而除了正在大力发展的工科面临教师缺口外，基础学科也一样需要有经验的教师帮带。“我们这里条件不如东部地区，教师人才少，青年教师经验不足。”熊仁次说。因为教师紧缺，一些需要小班教授的课程，不得不将两三个班合并在一起，进行大班授课。

这种情况也同样出现在克拉玛依校区。克拉玛依校区成立于2015年，是一所年轻的大学。“校本部已经给予克拉玛依校区很多支持，也派遣了经验丰富的学科带头人和中高层管理团队；加上教育部直属14所高校的对口支援，学校教学和人才培养工作平稳有序，进入良性循环发展阶段。”克拉玛依校区党群工作部相关负责人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介绍说。

“教师组成方面除校本部支持外，还有一部分校区层面招聘的教师。但是，由于校区地处西部，教师招聘工作面临较多困难，这种现象在前三年校区建之初要更加明显。”该老师说。

教师招聘困难的一部分原因源自大多数人对克拉玛依的陌生。克拉玛依校区党群工作部教师张宝是个地道的西安人。在刚刚来到克拉玛依时，他也曾经有过不适应，但是在他眼里，克拉玛依是座焕发着青春活力的城市。

“这里城市化水平很高，是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充满着活力与时尚，丝毫不会让人感到身处西部而略显闭塞。”张宝说，由于地处西部，加之石油资源和电力资源丰富，所以很多大型企业都在这里建起了数据中心或研发中心。

设立之初，克拉玛依校区就定下了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的石油石化专业设置方向，并设立了从石油勘探、开发、储运到过

银龄教师西部支教“远水”如何解“近渴”

■本报记者袁一雪

在教育部分案规划下，一批已经退休的银龄教师陆续前往西部，缓解西部教师资源紧缺的现状。他们虽已经到了安享晚年的年龄，却依然愿意走上讲台，教书育人。

不论高校还是教师，都希望通过这项方案带动西部教育的发展。但该方案如何长期进行下去，并通过政策倾斜吸引更多年轻教师前往西部，同时留住西部培养的人才，才是接下来必须面对的问题。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

程装备与控制、化学工程与工艺等上中下游全产业链的一系列专业。同时，为了服务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克拉玛依当地的发展，学校还设立了大数据和软件工程、金融以及俄语小语种等通用专业。

由于专业设置针对性强，学生也刻苦努力，所以克拉玛依校区的学生就业第一出路。今年6月，学校即将迎来的第一届毕业生中，学生的就业率将很高，且毕业生整体的综合素质也很突出。

此次针对银龄教师的招聘，克拉玛依校区列出的计划需求包括3名软件工程师、1名化工过程机械/控制工程师、两名金融教师以及思政教师。其中，对于金融教师的招聘条件，校区明确要求申请者需要懂金融风险和公司金融，而这些要求也是根据专业未来对口工作提出的。

最终，综合报名教师的年龄、身体状况和其他条件，克拉玛依校区从32名报名银龄教师中，成功录取了19人。

相较而言，塔里木大学收到的银龄教师申请更多一些。“我们报上了82名教师的需求，出乎意料的是，《方案》一经公布，便有十几所部属高校都对此做了相关宣传。”熊仁次说，目前他们已经接到了来自15所高校的69名老教师提交的申请。申请人中，最高年龄者为77岁，最小年龄者为60岁。

“支教的人数可能还会增加，因为直到现在，还有高校在跟我们联系。”熊仁次说，仅吉林大学一所学校，便最终确定了12人来塔里木。

到西部去

按照此前的计划，克拉玛依校区的开学时间应该在2月21日，但因为疫情原因，直到4月份，章卫平才来到这片从未踏足过的土地。

其实在报名之初，章卫平也曾考虑过生活和身体是否能够适应的问题。然而，在网上进行一番搜索之后，他对克拉玛依从完全陌生变为充满向往。“我觉得自己还有余力，便填写了报名表。”章卫平告诉《中国科学报》。

在经过申请、体检等一系列手续后，成为长期援派教师的章卫平，将在克拉玛依校区任教一学年，教学对象是大一新生，授课

内容为大学数学。

退休前，章卫平在北京邮电大学进行数学的课程教学已经有30余年的时间，相关的内容早已烂熟于心。然而，来到克拉玛依后，章卫平选择了重新开始备课。“教材略有区别，所以我重新准备了一下。”他说。

隔离结束后，除了教授学校内的学生外，章卫平还需要通过视频直播的形式，给暂未返校的学生上课。虽然到克拉玛依已有一个月，但是他还没有时间深度地感受一下这座校园和这座城市。“现在每天上课能看到一片湖，有时间要去校园其他地方逛逛。”章卫平笑着说。

也因为忙着备课，章卫平甚至都没有关注自己是否适应那里的生活，但是他对教学的投入以及给予学生的耐心指导是肯定的。“这里的学生很自觉，不需要老师催促。”虽然按照规定，他与克拉玛依校区只签约了一学年，但如果自己的身体允许，他希望可以继续干下去。

此时，在祖国的另一端，东北地区的夏天已至。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退休教师傅菁林一边打理着自己的退休生活，一边在等待出发的号令。

傅菁林是报名前往塔里木大学支教的

记者手记

关爱之外，更需持久

在采访过程中，对于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的推出，相关人士大多给出了正面评价，毕竟通过调动部分退休者依然有精力的教师的积极性，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西部教师资源紧缺的状况。

好事要做好，银龄教师计划在具体实施中，有一个特别值得提醒的“关键词”，那就是“健康”。

此次计划，教育部对于银龄教师的年龄做出了明确的限制，根据目前《方案》的要求，申报人员应是70岁(含)以下的教师，如果身体条件允许，年龄可以适当放宽。而记者从吉林大学等高校得知，一些超过年龄限制的退休教师申请已被教育部驳回。

老教师们热情可嘉，但健康因素仍

银龄教师之一。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此时此刻，她应该已经在塔里木大学，向学生们讲授《中国近代史纲要》的课程了。

塔里木大学位于南疆地区。此前傅菁林曾与爱人去那里进行过一次摄影采风，并对当地的美景念念不忘。不过，同样令她难忘的还有令人难以忍受的高原反应。正因为如此，当吉林大学对口支援新疆塔里木大学的通知下发后，傅菁林不是没有犹豫过，毕竟自己已经不再年轻了。

“此前，我们学校也曾有来自新疆的学生。在教学中，我的感觉是这些学生的知识确实比较薄弱。这次报名到塔里木大学支教，一个原因是西部高校的确有这方面的需求，另一个原因则是我还想证明自己‘宝刀未老’。”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傅菁林说。

虽然还没有踏上往南疆的旅程，但对于未来自己所教的课程，傅菁林却已经有了一个“腹稿”。“在讲授《中国近代史纲要》时，我会根据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以史为鉴，在教学中加入对东北鼠疫、日本731部队细菌战等历史事实的讲解，以此加深学生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认识。”

更让傅菁林家人感到心安的是，此次她的一位喜爱摄影的好友也加入了支教的行列。“教授的是机械学。”傅菁林说。

根本还在顶层设计

长期以来，西部建设始终是国家关注的重要方面，西部发展也离不开优秀人才的支撑。正因如此，近年来，国家层面的人才培养政策在不断向西部倾斜。比如在2001年5月，教育部就正式启动了“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其中提到，西部受援高校选派青年教师前往东部支援高校进修学习，同时支援高校则选派干部和教师到受援高校任职授课。

然而，由于东部地区，特别是东南部地区高校本身存在的经济、科研项目等优势，对于优秀人才有着更大吸引力，近年来，人才“孔雀东南飞”的现象始终没有改变。

今年2月28日，在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副部长翁铁慧表示，扩大硕士研究生招生的规模，比去年可能会增加18.9万。据透露，此次扩招的名额将重点向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高校倾斜。

在此背景下，西部高校师资力量的短板将更加凸显。既然青年教师难以留在西部，那么将退休教师引入西部，以“远水”解“近渴”，则不失为缓解西部高校教师短缺困局的一条可行之路。

对此，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具有丰富教学和学科经验的退休教师的支持和奉献，对于西部高校来说固然是一笔优秀的资源，但超过60岁或65岁的高校教师，虽然在专业领域和教学领域中已经成熟，但同等条件的优秀青年教师比银龄教师更具有优势。特别是就年龄而言，银龄教师虽然具有丰富的经验，但他们的想法可能停留在过去。而青年教师与学生年龄差距小，能运用多媒体手段丰富课堂教学；在生活上，也更容易理解学生的想法，与学生打成一片。

所以，“银龄教师的工作值得肯定，但如果只靠银龄教师，远不能解决西部高校教师短缺问题。”显然，储朝晖认为，“要想解决根本问题还是得依靠顶层设计，让资源配置更合理。”

事实上，早在2018年，国家就曾面对西部中小学推出过银龄教师计划。该计划鼓励退休教师到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的中小学，通过直接任教、进行示范课教学，或与当地其他教师组织教学研究等方式，将退休教师的经验传给年轻一代教师，也让各地中小学生学习得到实惠。

为了顺利推行这一计划，国家还通过各级补助，保证参加银龄教师计划的各位退休教师，每人每年能领到不少于2万元的补助。

“然而，中小学校的银龄计划最终所产生的效果只能说是‘一般’，特别是县城以下地区与城市差别较大，有些年龄较大的教师不适应。”储朝晖说，“尽管高校往往设在地级市及以下的地区，应该不存在这些问题，但是老人的生活要求一般都要比年轻人高，如何处理好生活上的问题，是每个西部受援高校都应该注意解决的。”

在受访时，塔里木大学和克拉玛依校区均表示，银龄教师放弃东部优渥的退休生活，主动前来支援教育，令人敬佩。他们已经为即将到来的银龄教师准备好了住房，同时也做好了相关后勤准备，“只待银龄教师来”。

应放在首位，这是对他们真正的关爱。另外，必须承认的是，目前《方案》对于相关的保障措施已经做了详细规定，例如长期援派的银龄教师有补助，并可依据高校实际情况适当提高补助标准。同时，对于往返交通费用和保险费用也做了要求。就目前采访情况看，相关高校也都为支援教师提供了良好的住房条件和完备的生活设施。

这些措施如果落实得良好，相信会有更多银龄教师前往西部发挥余热，帮助西部地区“内部造血”。但同样需要提醒的是，银龄教师计划不会是短期行为，这在客观上对高校相关制度和措施的持久性提出了考验。这方面，我们的高校更应做好充分的准备。

中国大学评论

尤小立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近日，《教育部社会科学司2020年工作要点》中有关重点支持“文科实验室”建设的内容公布后，有媒体为之欢欣鼓舞，但相关报道不知为何要采用“文科生不再受鄙视了”这个颇为夺人眼球的标题。

“职业歧视”可以追溯到上古社会分工、职业产生之时。“学科歧视”也出现在古代，那时是资政的传统文史占据绝对优势，而与技术相关的行业则被排斥在正统之外，这也是“李约瑟难题”出现的原因之一。上世纪初，中国大学采用西方学术分科制后，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史渐渐式微，“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理工优先意识在中国社会流行开来，且延续至今。但仅以有无“实验室”来衡量文科与理工科之间的长短优劣，未免过于简单化了。

其实，“文科实验室”也不是“新生事物”。早在20年前，四川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即建立了文科类的新闻摄影实验室。此后，一些大学的管理学、法学、教育心理学、财政学、会计学、文秘、影视动漫、艺术设计、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等文科专业的实验室也陆续设立。2012年教育部对全国501个国家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进行验收，其中就包括27个文科类的“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技术及其衍生出来的新范式运用到大学文科的教学及科研之中也是必然的。从学科交叉的趋势看，大学文科也确有借鉴理工科的研究方式、方法的必要。但任何有关的政策措施都要经过实践，才能检验其真正价值，不应该在政策措施出台之初就一味地张扬优良而忽略困难和不足，这是其一。

其二，“文科”这个名词既包括文史哲一类的人文科学，也涵盖了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而像新闻传播学等则兼具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特性，所以现在谈论“文科”必须先厘清概念。

从大学的现实看，建立“文科实验室”的主要是社会科学专业和文秘、市场营销一类的“应用文科”专业。这些专业受新技术的影响更大，也更为直接，需要“实操”过程的培养和训练，才能适应社会和职业的要求，建立相关的实验室自然有其合理性。

但是，时下的“文科实验室”多数仍偏重于模拟、实训，类似理工类基础学科的教学实验室。与研究型的理工类实验室不同，它更多的是技能和职业的培训，并不能直接产生足以影响学科发展的科研成果。因此，建设“文科实验室”只是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其效应不可能体现在弥合文科与理工科之间的鸿沟之上，至于消除理工科对文科的所谓“鄙视”更是无从谈起。

这样说，并不是在认同有关文科与理工科关系上的社会偏见，而是为了明确二者之间的学科界限。就当今学术发展看，学科交叉和跨学科早已是必然的趋势。但学科交叉和跨学科的前提条件是先要有自己的“学科”，以这个学科为基础才能谈“跨”到其它的学科或者学科间融合。否则，就成了瞎子摸象，即便是跨了学科也未必自知。

明确学科界限，不是要比较学科之间的高下，而是为了明确各个学科之间的不同分工。胡适当年所言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讲的就是学科的平等性。

一般而言，理工科是基于实验的科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则是基于人和社会的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说，理工科的实验室多于文科，是学科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文科无须在数量上进行攀比。而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既然是人与社会，那么它的“实验室”就应该是整个社会。大学生的“社会实践”不是单方面地向社会学习，更多的是在用专业知识分析和研究社会，最后锻炼一种改造社会的能力。

概念的明确也是保证政策措施彻底贯彻和正确执行的基础。现如今，有关中国大学发展的意愿确实很强烈，但从过去的经验看，务实地提升水平较之大张旗鼓的宣传对于大学的发展更利。一些新近发明的诸如“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和“新文科”等等有关大学改革的新名词，虽然已经在执行和落实之中，但新名词本身的内涵与外延均处于未完成或相对模糊状态，边讨论、边摸索、边执行的过程，对政策目标达成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文科实验室”也不例外。它仅仅是适应时代、促进大学文科发展的手段之一，没有必要把它的作用夸大到拯救整个“文科”的高度。它更不可能一举扭转有关理工科与文科的社会偏见。

总之，明确概念是防止“概念化”倾向的前提。只有超越了“概念化”，政策和措施才会产生实效，也才真正有利于学科的完善和大学的发展。

『文科实验室』建设应超越『概念化』